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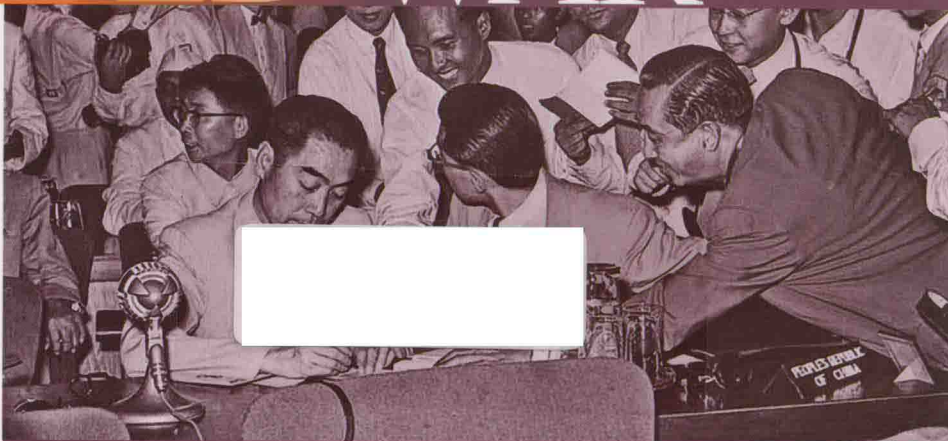
1955年至1965年，中国将亚非国家当作需要加以团结的统战对象，因此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始终是一种统一战线政策，而这种统一战线政策又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反美统一战线和排除苏联势力的反美统一战线。

从万隆 到阿尔及尔

——中国与六次亚非国际会议

(1955 — 1965)

COLD WAR



李潜虞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冷战
国际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从万隆到阿尔及尔

——中国与六次亚非国际会议 (1955~1965)

李潜虞◎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中国与六次亚非国际会议 (1955~1965) / 李潜虞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012-5121-6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 亚非会议 (1955) —史料 IV. ①D8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1778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中国与六次亚非国际会议 (1955~1965)
Cong Wanlong Dao Aertjier—Zhongguo Yu Liuci Yafei Guoji Huiyi (1955~1965)

作 者 李潜虞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21¼印张
字 数 345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3月第一版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121-6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李丹慧

编 委（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建才	蔡佳禾	陈 兼	崔 丕	戴超武
邓 峰	黄民兴	李丹慧	刘晓原	罗养毅
牛大勇	牛 军	沈志华	王晓德	夏亚峰
徐 蓝	徐思彦	杨奎松	于 群	余伟民
翟 强	张小明	张曙光	章百家	赵学功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总 序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国际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所谓“国际史”，其含义有两个层面，其一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其二则在于，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除阵营国家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一方，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涵与外延，已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史所能囊括的了。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即之，以俄国档案的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诸于世，加上原有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战时期的历史。所有这些构成了冷战史研究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率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建立

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团队。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

当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成为过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即逐渐拉开，各国冷战史学者得以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对冷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冷战的起源，冷战思维对各国决策层的影响，大国关系对国际政治力量改组的影响，小国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影响，美苏之间冲突、遏制、对抗和缓和的交替过程，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冷战因素，冷战框架和冷战思维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再思考。由此，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新的热潮，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课题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等，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被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近些年来，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日渐深入，其主要学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了国际学者队伍。在美国和西欧，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以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等，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冷战史研究中心，法国的“欧洲认同、国际关系和欧洲文明”研究所等冷战研究机构。而中东欧各国也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除俄罗斯科学院冷战史研究中心外，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在亚洲，比较活跃的有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韩国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

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有冷战史研究小组。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2. 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3. 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历史事实的重建。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在于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而是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现代史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阙如，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的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扭曲的或被歪曲的。如今，随着对峙双方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公布，以及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弱化，冷战历史的原貌开始浮出水面。冷战史演进的全过程进入重建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4. 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需要多国学者利用多国档案共同参与讨论，如此才能更有效地辩明事实真相，总结历史教训。

5. 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在持续关注冷战起源、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中美和中苏关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诸多热点问题的同时，冷战史学者也开始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注重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从战后基

本同步、并列延伸的冷战和殖民主义瓦解的进程来看，冷战的发展实际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多元化特征的历史过程。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地区争斗的日益激烈，使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冷战对峙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大历史脉络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冷战的规模由此拓展至全球。这其间，第三世界扮演的角色不容忽略。只有进一步考察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的地位和影响，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此外，冷战国际史研究还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宣传战一心理战”等研究逐渐兴起，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向。战后以来，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各类专门史，都不可能摆脱开冷战这个核心；与此相应，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冷战时代本身。也只有运用多维视角，才能完全展现出冷战史作为一部国际史的价值和魅力。而就方法论言之，一些学者正尝试着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冷战国际史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新建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义。

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以此，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了这一学术潮流中。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因此，与其他学科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科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目前冷战史学界的新趋势也是贯穿在中国冷战史学科发展之中的。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作为中国学术界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已经确立起来。

不过，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和需要改

进之处。其一，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仍然是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大宗产品”，从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学者比例过低。其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对比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三，偏重政治、外交和军事史研究，对社会、科学、经济和文化方面冷战的研究尚嫌重视不够。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还须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学者们的视野应该不断“扩张”，探索也应该“面面俱到”。毕竟冷战的历史极其丰富和鲜活，队伍庞大的中国的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均衡地关怀和揭示冷战史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利益和权力展开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战年代的是是非非。面对新产生的“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国际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人们只有通过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由于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史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运动规律、应对及管理现实的国际危机，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战略性评估。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将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

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学者的冷战史研究新作，以及口述历史著作。该套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中外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学科，必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必将以其客观、严谨、厚重、创新的学术品质，跻身于世界史林。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2年6月

序 言

李潜虞博士的著作《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中国与六次亚非国际会议（1955—1965）》（以下简称《从万隆到阿尔及尔》）终于要出版了。我作为李潜虞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指导老师，首先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这本书是在李潜虞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修改而成，由此可以体会到作者的认真和辛苦。记得当年李潜虞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访学期间，我恰好有机会在美国威尔逊中心做访问学者。那时亲眼见到他每天前往各有关档案馆查阅和收集资料，其专注与认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能直接体会到其中的辛苦。当然，做历史研究也惟其如此才会有所成就。这本书的问世是李潜虞付出了巨大而辛苦的努力的结果，也表明了学术界和社会对他的研究的认可。

我同意接受李潜虞的邀请为《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作序，首先是为尽与李潜虞的师生之谊。李潜虞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四年里，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与他相处其实是我们不断讨论、相互切磋的过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的具体内容，有些的确是之前我闻所未闻的，甚至也是难以想象的。客观地说，作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教师，我从每位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那里都获得了大量的新信息和有意义的启发，对我自己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很遗憾以后这样的机会必然会越来越少了，借此一并感谢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们。

不过还是要说明，我接受李潜虞博士的邀请做序，并不仅仅是为师生之谊以及因为我相信他通过对这本书涵盖的内容的钻研，对这个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在李潜虞完成其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与他的多次讨论，以及看过他多次修订后即将出版的书稿，我感到如果能利用这样的机会，扼要地表达我对本书内容的一些想法，不论是对读者阅读这本书，还是对相关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都会是

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从万隆到阿尔及尔》通过叙述和分析中国参与第一次亚非会议即史称万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和第二次亚非会议等六次亚非国际会议的进程，阐述了1955年至1965年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从万隆到阿尔及尔》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在这十年间对亚非国家政策的著作。这对更完整地叙述和了解中国外交的历史固然重要，不过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是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外交历史的研究视野和领域，奠定了一块基石。我经常向博士研究生表达这样的看法，即每位研究者的成果包括博士生的论文，都可以也应该是为推进某个领域的知识向前发展，铺下一块后来者可以有信心地立足之上再向前行的比较牢固的垫脚石。

李潜虞在绪论中说明，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这是基于对题目所概括的对象的严谨界定。我认为，全书内容基本反映了中国对这个时期兴起的亚非运动的政策。1955年至1965年这十年是美苏冷战对抗比较复杂的阶段，这是这六次亚非国际会议发生和中国处理相关问题的主要背景。作者对这方面的叙述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在绪论中突出强调了冷战背景的重要性，这对理解全书的架构和叙述线索是很重要的。

《从万隆到阿尔及尔》的第一个特点是系统和详细地叙述了1955—1965年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的演变的具体过程。这个叙述虽然还可以更加深入，但这确实是过去无人尝试过的。在历史研究领域中，通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不少研究成果都是以叙事作为首要和基本的特点，然后逐步从中——有些是作者在后来的研究中，有些是其他研究者在不同主题或领域的探讨中——解读其中的意义。准确和尽可能全面的叙述对于历史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尽管那远不是全部目的。大量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和新知识的形成，都是从对历史和当下社会现象的仔细观察中开始的，这是任何基于某个理论的研究都无法根本替代的一个认识过程。《从万隆到阿尔及尔》的重要价值也在于此，它为读者展现了中国外交历史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画面，告诉了读者一个非常基本但远非不重要的事实，即在冷战背景之下出现的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有一个相当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不仅同中国的国家身份有关，而且受到不同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变动的重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起，其对外政策所应对的主要外部环境就是美苏冷战。一个时期以来的研究证明，新中国的诞生同冷战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政权的对外政策不论主要内容和特点为何，都是面对既定的冷战国际体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从万隆到阿尔及尔》所概括的十年是冷战体系激烈变动的时期，中国对外政策也在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带着中国自己的特色。这本书如实地展现了这个调整过程对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即中国处理与亚非运动的关系有一个从“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向“反美统一战线”转变，再从“反美统一战线”向“两面开弓”的“反美反苏并重的统一战线”转变的过程。书中明确清晰的叙述揭示了以往教科书和通史类图书所忽视或很不重视的一项内容。那种将中国的有关政策简单地建立在“奉行和平共处”和如何“发展友好关系”等基础上的叙事，有必要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做出新的补充和解释。毕竟，在这种持续而明显的战略性政策调整的带动之下，中国与相关亚非国家间的互动不受影响是不可想象的，包括中国外交行为出现哪些变化，以及相关的亚非国家到底做出何种反应，都需要做进一步精确的叙述和解读。

《从万隆到阿尔及尔》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书中使用的历史档案材料很丰富，作者说这是他“感到骄傲之处”，这是有道理和有根据的。这首先表现在这本书中包括了中、美、英三个国家六个档案机构的档案，这些机构包括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书中使用的档案资料大部分都不属于宏观政策一类，它们都是关于非常具体的事件的材料。通过把那些涉及具体事件的档案资料汇集起来，经过分析、比照和处理后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历史画面，其实是不容易的，也是历史研究必须具备的一项起码的本领。难能可贵的是，李潜虞认为“在修改整理书稿的过程中，好像又回到了那些做档案研究的日子”，并感叹“那可真是一段好日子啊”。痴迷如斯者终会修成正果。就当今的学术潮流而言，在国际学术界的冷战史研究这个领域，只掌握一个国家的档案来书写一个国家的外交历史，已经越来越不被接受了。因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外交档案已经或正在开放，这在客观上为利用多边档案印证国家间的互动和一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合理性和客观效果等提供了可能性。这本书从一开始就走在中国新一代外交史研

究者应该走而且也是不得不走的轨道之上，这应给予赞扬。

其次是《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中大量利用了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收藏的历史档案，这是这本书得以完成的特别重要的条件。毕竟，一本写中国外交的著作首先就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中国的外交档案。在中国外交研究发展到今天的阶段，那种仅仅根据政府公开文书和政府的媒体报道，甚或凭“想当然耳”就落笔千言的所谓成果，将越来越难以为学术界所接受。专门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中国收集外交历史档案有特殊的难度，本人对此有切身的体会。这些年来陆续接触了很多国内外的青年学生和学者，他们为撰写有关中国外交的论著而不辞辛苦地跑到北京和北京之外的其他地区，甚至跑到基层等地，收集中国的历史档案，其真诚、认真和努力的程度令人动容。中国外交领域的研究能取得今天这样重要的进展，同他们对待知识的真诚和勤奋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说这些话行外人可能不容易理解，这里照录李潜虞在后记中的一段描述，它再现了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后一个时期里，国内外青年学者们在外交部档案馆收集历史资料的真实情景。

我记得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最初的开放借阅处大概只有10台电脑终端。随着中国外交档案解密得越来越多，中外学者（主要是外国学者）蜂拥而至。为了抢到一个座位，很多学者要在档案馆开门前一个小时就到门口去排队，稍微晚到一会儿就有可能抢不到座位，一整天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了。中午11点半，档案馆工作人员吃午饭，档案馆关门，我们却无处可去。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朝阳门外的各种快餐厅、超市、咖啡店，乃至二环路边的人行便道都是我们的休息室。

行文至此忍不住写两句与这本书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的话。中国政府现在提倡“走出去”，也包括了“学术走出去”这样的号召。客观地说，中国的历史研究，不论是哪个领域的历史研究，都有优秀的传统，同时也必须符合当今世界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不同领域的具体规范固然有差别，但“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是最起码的要求，在历史类研究中不过更强调证据的可靠而已。做外交史研究则离不开外交档案，这也是最起码的规范，而问题恰恰是中国学界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特别突出。举个例子，美国方面已经解密了有关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后的主要外交档案，

包括与中国领导人历次峰会的会谈记录。不仅是外国学者，就是中国的不少研究论著也都是根据这些档案写出来并发表的，而中国方面的相关档案仍然没有开放。不按照相关规定解决查阅档案难的问题，中国外交史研究是很难“走出去”的，甚至会很难“走下去”。当然，《从万隆到阿尔及尔》能够以现在的水平问世，还是要感谢外交部档案馆的开放。我相信李潜虞会同意这个判断，即没有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开放，如实地叙述中国的有关政策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如果将这些年来中国外交史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潮流作为参照，阅读《从万隆到阿尔及尔》还会引发对两个重要领域的追问和进一步思考。它们分别是：这个时期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与中国国内政局变动之间的关系；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不同的新兴国家运动中的地位。第一个问题在书中已经有所涉及，如第二章第三节第一个问题“反美统一战线政策的完全确立与对‘三和一少’路线的批判”中的部分内容，涉及到当时决策部门在对外政策领域存在的不同意见，主要是中联部领导人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其背景则是决策层内部围绕如何消除“大跃进”运动的后果出现了意见分歧，结果是王稼祥辞去了中联部长的职务，并遭到批判。

实际上这个时期中国外交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冲击并非仅此一例，王稼祥的辞职是之前发生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被免职过程的延续。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之后，张闻天被打成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8月下旬到9月中旬召开了全国外事会议，检讨批判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以及他“里通外国”即与苏联勾结的“错误”。10月下旬，外交部又召开专门会议，继续批判张闻天的外交思想。^①这两次会议期间对张闻天“和平共处”主张的批判对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的不断激进化是否造成了影响，是值得追究的。因为之后不久，中国对外援助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总体上升，从1960年的0.55%上升到1962年的2.8%，其中最

^① 参阅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天谱一九四二~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6—1157页；萧扬：《张闻天与中国外交》，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6—144页。张树德：《毛泽东与张闻天：跟着真理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256页。该书简要说明，庐山会议以后外事系统开会批判张闻天“里通外国”，张闻天曾为此类批评而落泪。

主要的都用于对亚非国家的援助。^①这在领导层中会引起进一步的分歧也在情理之中。王稼祥在1962年春提出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的政策建议和最终被批为“三和一少”，不过是新一轮分歧和斗争的继续。之后的1963年是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转向全面激进化的关键年份，这在《从万隆到阿尔及尔》的叙述中清晰可见。有关中国内政和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关系的内容在书中不多，但还是很有启发的，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厘清中国国内政局变化与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激进化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到底有何种影响。

就国内政治对外交的影响角度，上述领导层中那些与对外政策并无直接关联的矛盾如何冲击外交领域，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总的看，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还远没有深入到决策制度和体制的层次，这是很不合理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同历史档案仍然没有公开有直接关系，凭着尝试和理论的推断，并不足以建构起经得起检验的知识架构；另一方面，这个领域仍然缺少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足够广泛的交流，这也造成研究视野比较狭窄和思考深度不够。从体制层面看，中国对外关系并不仅仅是外交部的工作，很多事务并不都经由外交部处理。从各种历史文献和已经大量出版的回忆录看，我们除了需要了解中国领导人，还要研究参与对外关系和处理外交问题的体制和机构。这些机构至少还包括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调查部、军队有关单位等等。在档案公开并对这个复杂的体制及其运作程序和特点进行系统研究之前，实际上也很难确定在那十年间，外交部在中国外交中的确切地位和作用。显然，仅仅围绕领导人文集和外交部公布的档案撰写的外交史，仍然不能说是完整的和准确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那十年里，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不同的新兴国家运动中的实际影响和地位如何，这个问题涉及到十分宏大和重要的领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回答，将在深层次上影响中国人对当今中国世界地位的思考。客观地说，中国的外交史学界在这个领域还没有提供足够高质量的成果，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展开讨论和思考，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合理的。

^① 财政部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二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著名的国际冷战史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2007年出版了《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 and Making of Our Times*），本书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它极大地开拓了学界对冷战全球性扩张的广度和深度的研究视野，尤其是揭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那个时代对冷战的回应及其对当代世界秩序的深刻影响。从全球冷战的图景中解读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命运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将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动态互动结构中的主体加以叙述和分析，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新潮流，它直接连接着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的几乎各个主要方面。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and 影响该如何界定和评价，应当是中国学界，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的使命之一，也是非常值得为之做出努力的事情。

文安立在《全球冷战》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虽然本书主要是关于国际体系的问题，对中国直接着墨不多，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某些对中国的关切仍居于本书历史解说的中心位置。毕竟，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在冷战中发育起来的，而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也是在那个年代建构起来的。中国与冷战的关联纷繁复杂，我希望中国青年学者担负起一个富有挑战的责任，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解释中国和冷战的关系。”我赞成他的期待，即从中国的视角解读冷战以及中国与冷战的关系。不过基于中国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状况，我认为在界定中国的角色和作用时，很需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避免无条件地和认为可以不证自明地将中国视为冷战时代的地区中心和相关重大事件的主要行为体。涉及到《从万隆到阿尔及尔》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要经过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从而论证清楚中国在不同的新兴国家运动中，到底占据何种位置；中国的政策对亚非国家的命运产生过何种积极的亦或消极的影响。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学界还没有提供足够的高质量的成果来支撑一项宏观的和站得住脚的判断。

我们共同面临两方面的制约：首先是学术方面的基础薄弱。这表现在对中国相关政策涉及的许多国家的基础研究很薄弱；对它们在那个时期如何回应中国的行为和诉求，几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一些研究成果中据以做出判断的依据，竟然是中国方面的记录和分析，这些中方的历史文献和档案不仅数量相当有限，而且本身就需要用当地的记录加以验证。这方面缺陷的修补将是非常困难的。这种状况提醒读者，对于这个

领域的任何研究成果或讨论中的重要判断，都要保持一些怀疑和谨慎的态度。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新一代学者有意识地着手改变上述情况，很有可能使这个领域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

其次则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观”，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维，包括观察外部世界的视角、态度和偏好。在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中，如何避免“中国中心观”的不合理影响，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既是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和新兴国家大量出现的时代，在很多新兴国家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有着同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样伟大的抱负，要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赢得尊严，找到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使世界变得更加光明。他们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的杰出人物如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南斯拉夫的铁托等等，无一不为亚非国家的各种运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不同经历和在那个时代的复杂诉求也导致了不同的世界性政治潮流，包括中国热衷的亚非运动，以及中国不热衷的不结盟运动等。后者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程度和它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意义显然是前者无法相比的。如何将中国的政策置放在这样一个可以用“群雄并起”来形容的局面中加以解读，评价其利弊得失，是一项繁重但无法回避的工作。

客观地看，身处这样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风云时代，中国人包括那些杰出的中国领袖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学习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先验地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足够的经验，立即全面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特点，合理应对第三世界国家对这个世界的塑造。今天，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当年对第三世界国家了解和研究的不足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严谨地分析、解读中国人当年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这个“学习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论证具体政策的道义力量和证明领袖的正确，才是更有意义的工作。面对事实解读历史，是在这个领域做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基本态度。总之，在《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一书所叙述的时代，全球力量对比因为亚非国家的兴起而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亚洲和中东等地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互交织，不仅使亚非国家受到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外来影响，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了亚非新兴国